

# 危言自纪

余英时自著



——余英时自序集

彭国翔 编

余英时作品系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余英时作品系列

# 危言自记

——余英时自序集

彭国翔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卮言自纪: 余英时自序集 / 余英时著; 彭国翔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余英时作品系列)

ISBN 978-7-301-20451-1

I . ①卮… II . ①余… ②彭… III . ①序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5788 号

**书 名:**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

**著作责任者:** 余英时 著 彭国翔 编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451-1/K · 08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mailto:pkuphilo@163.com)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86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彭國翔先生合作，決定為我出版一套別出心裁的「作品系列」。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懷舊集，也許還加上一部訪談錄。我為什麼說「這一系列是別出心裁呢？」因為其中所收都是我個人感所思之作，與我立一般史學論著中儘量將自己放逐在外的風格，直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借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概念，前者屬於「有我之境」，後者則屬「無我之境」。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別出心裁之所在。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過一學期。燕國的師友和風景後來一直繫繫在我的心頭。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隨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其他團員者然都認為是到了北大，祇有我一個人感覺是回到了離別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們一夥人經過未明湖畔時，我還極其匆忙地獨自跑到當年的宿舍（燕大第三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彷彿感到這母校對於一個遠方校友的親切照顧。彭國翔先生費了極大的心力編選這一系列，我對他的感激不是一句空言，這謝之語特約表達於第一冊。是為序。

余英時 二〇二二於美國普林斯頓

---

“余英时作品系列”

---

## 自序

---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余英时

2012年2月1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

——《民主革命论》自序(1953)/1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1981)/7

《文明论衡》自序(1955)/9

《自由与平等之间》自序(1955)/11

《方以智晚节考》自序(1972)/13

实证与诠释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1986)/15

《方以智晚节考》新版序(2011)/20

《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1975)/22

《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1996)/31

《历史与思想》自序(1976)/3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1977)/47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自序(1980)/51

从史学看传统

——《史学与传统》自序(1981)/55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1986)/68

“士魂商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1988)/88

“明明直照吾家路”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自序(1986)/92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序(1997)/100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2010)/103

- 《士与中国文化》自序（1987）/ 119
- 《士与中国文化》新版自序（2003）/ 129
-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自序（1987）/ 137
-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1988）/ 144
-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新版自序（2011）/ 146
-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自序（1991）/ 148
-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自序（1992）/ 152
- 《钱穆与中国文化》自序（1994）/ 154
-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1995）/ 159
- 《现代儒学论》自序（1996）/ 184
- 《论士衡史》自序（1998）/ 192
- 《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 / 194
- 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2003）/ 207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文集》总序（2004）/ 216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文集》新序（2006）/ 218
-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自序（2004）/ 220
-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自序（2007）/ 231
- 《会友集》自序（2008）/ 234
- 《中国文化史通释》后记（2009）/ 253
- 《人文与民主》自序（2010）/ 256
-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跋（2011）/ 259
- 编后记 / 263

#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

## ——《民主革命论》自序（1953）

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我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

根据我个人初步的认识，中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只是旧社会的解体，而不是新社会的重建。中国革命一再陷入错误的泥淖之中自有其客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也是本书所要探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对于革命的任何客观研究并不是否定革命与人的关系。反之，人的主观努力常常是革命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革命自然也不能例外。革命最初是由少数人发端的；这些少数人是怎样展开革命运动的呢？撇开其他一切不谈，首先他必须具备一种与一切安于现状的人们截然不同的新精神，这精神驱使他去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精神”。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精神，每一民族有每一民族的精神；因之，革命精神也随着革命性质、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殊异。但在这许多不同之中却存在着一个最相同之点，那就是革命精神的健全与否，绝无例外地规定着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革命的一连串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我们偏激的革命精神的必然结果。



往者已矣！我们且不必去重翻历史的旧账。我从反对“革命”到追求对革命的了解，而终于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更丰富、更严肃的意义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精神的影子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个残破的国家，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革命精神呢？这是最迫切需要答复的问题，也是最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下面我试着提出我个人的答案。

我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范仲淹要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断不是那为一己或一小群人的利害打算的人们所能够完成的，我们只有具备着壮阔的襟度，伟大的抱负，并视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然后才能献身于革命的大业。在革命的行列中，个人主义的色彩应该尽量减少。个人权利，群己权界在常态发展的社会里都是必须讲求的，可是自愿为革命大业而奋斗的人却不应斤斤计较这些。为大我而牺牲小我并不是否定小我的存在，而是化小我于大我之中，为革命而暂时放弃个人的若干权利也正是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求取更多的个人权利。如果你不愿如此，你尽可以不参加革命运动，革命也绝不能带有丝毫的勉强，但一旦你参加了革命，你便不能没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然而仅仅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并不够保证我们成为革命者，因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同样可以选择保守的方向，在旧社会的传统理念之下，为维持旧社会的存在而努力。例如范仲淹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显然不是革命者；此外中国还有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因而更进一步我们还得有冲决网罗的精神。旧社会

的持续不坠绝不是完全依赖着有形的力量，事实上它是有一层层无形的天罗地网在束缚着我们的成长，腐蚀着我们的灵魂，消磨着我们的壮志。谭嗣同说得好：“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为考据为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诚然，谭氏冲决网罗的内容今天已十九失去了意义，可是他这种否定旧有一切的勇气却仍然不失为一种蓬勃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上，我们曾看到无数人，满口的新名词，言论比谁都激烈，然而到了实践关头竟和旧社会的腐败分子毫无二致。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缺乏冲决网罗——尤其是“利禄之网罗”的精神。我们往往因不能毅然就舍弃我们在旧社会中的既得利益，在义与利的冲突之下，终于走上了投降妥协的路。其实我们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地冲决旧社会的天罗地网，在自己的新的精神还未曾建立起来之前便处处抱着退缩的态度、妥协的思想，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事业，更不必说创造新的社会了！因此“冲决网罗”乃是革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

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和冲决网罗的勇气，是不是就算具备了健全的革命精神了呢？还是不够。我们知道，革命不仅是情感之事，更重要的还得仰赖着理性——个人的理性、历史的理性——的光辉。我们不难发现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志士，有着救世的胸怀，也有着沸腾的情感，只是因为认不清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为革命只是不顾一切的破坏，于是在狂热症的驱使之下，走上了残杀恐怖的革命道路。结果革命给人们的不是更多幸福，而是更深的苦难。这样，我们了解了革命的第三重精神——弘毅精神的重要性。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革命正是“任重而道远”之事：社会的全面重建，任不可谓不重；百年以至数百年的大业，道不可谓不远。有些革命志士一方面误认革命只是政权的推翻或阶级斗争；他们的革

命目标既如此褊狭，胸襟自不免也随之缩小。于是许多本来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人们，在他们眼中竟都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遭到无辜的迫害。“不革命即反革命”，“对敌人的宽大即是对自己的残酷”等等偏激之词也都成了他们的革命信条。这是缺乏“弘”的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把革命看得太容易，把破坏旧社会看做革命的全部内涵，因而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完成革命的神迹。在这种“速变”的要求之下，一切残暴的革命方法便很自然地被采用了。他们革命的热忱化成了匹夫之勇；虽一时表现得波涛汹涌，却不能持久，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又是缺乏“毅”的精神的明证。而弘毅两种精神则都是理性而不是情感的产物，因之这二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精神的两面表现，是绝对分不开的。有了弘毅精神，革命才不会发生盲目冲动的危险，才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重新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这三重精神都齐全了，就革命本身说，已经可以算是完整的革命精神。但是，再深一层看，把革命全程配合到历史的长流中去，我们显然可以发现，这种革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当在这三重精神指导之下的革命已经完成了，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谁能保证领导革命的人们不会重新成为革命的对象呢？上述的三重精神都是积极性的，也就是使革命的领导者可以逐渐获得权力并巩固此权力的掌握的精神。我们不敢说人类一定有着爱好权力的天性，可是权力对于人们的引诱力却无疑是够大的。在革命过程中所获致的权力最后很容易成为革命者本身的一种“执”，而引导他们走向新暴君的途径。历史上有许多革命成功后反而变了质的，也都因为摆脱不了权力执的缘故，在这里，革命第四重精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被肯定了。老子的精神本是消极的，可是这种消极精神在限制积极的革命精神的过度发展上却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革命需要“生”、需要“为”、需要“长”，但不能“有”、不能“恃”、更不能“宰”，一旦革命陷入了“有”、“恃”、

“宰”的泥淖之中，则前面三重革命精神便会立刻化为乌有。法国名史学家谭恩（Taine）曾指出法国革命的领袖们之所以进入疯狂的状态，乃是由于恐怕失去革命的果实所致。这正是“有”、“恃”、“宰”的最好注脚。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也并不是叫我们在革命成功之后便立刻退出社会；它与“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等等为一己利害打算的明哲保身的哲学毫无相通之处。社会的进步是永无休止的，革命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中止。因之，即使在那时我们也依然要“生”、要“为”、要“长”的；问题只在如何防止“有”、“恃”、“宰”罢了！

这四重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冲决网罗的精神，弘毅的精神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的融合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健全的革命精神。在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的感召与控制之下，革命才能热情而不盲目，积极而不残酷，建设而不妥协。这四重精神也可以说是一层一层地建筑起来的，它们的次序也正可以解释为革命发展的四个阶段。

“革命精神”一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它的真义究竟如何却很少人曾严肃加以考虑。但革命精神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革命都表现一特殊的革命精神，每一革命精神都通过一特殊时空的人的活动而显现。因之，我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精神便不是一般性的革命精神，而有其特殊的时代性。这一革命精神，正如本书的名称所显示的，乃是民主的革命精神。我不敢说，这种革命精神可以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但我却敢说，只有在这种革命精神的笼罩之下，民主革命才可以不致走入歧途，并能完成它自身的历史任务。

革命精神虽然起于社会上大多数人们的共同革命要求，但却出现在实际革命发生之前，并且是实际革命的最高指导。这种革命精神最初只存在于少数人之间，随着时间的进展，它逐渐地弥漫及于社会的每一角落，而形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到了这时，革命的

时机才算成熟，革命的号召也就能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响应了！我们今天又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革命，这一新的革命迫切地需要着上述那种革命精神的支持，可是我们瞩目四望，这种新的革命精神却显然还不曾建立起来。我深信，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新展开，必有待于一群具有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的革命志士的出现；而革命大业的最后完成则更有待于此一新革命精神的光芒照遍每一个人的心头！如果我这一番对革命问题的讨论也能够使读者们获得同样的信念，那么这本书的出版总算是没有白费纸张了！

1953年10月20日 香港

##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1981）

这本小书从开始撰写到现在，已整整三十年了。当时我自己尚在香港新亚书院读书，但同时也在流亡知识分子所办的一个周刊《自由阵线》兼任一部分编辑工作。我所负责的是“青年天地”一栏，专门在知识与思想范围之内谈些浅近而有趣的问题。因为对象都是像我一样的青年读者，所以这一栏的文字都是些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我自己也用艾群的笔名辟了一个专栏，名曰：“山外丛谈”，取苏东坡“不见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1950年代初期的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一般青年人并不注重思想；而略有思想的又不免被“革命”的狂潮席卷而去，情绪十分高昂，但是完全失去了理性。我当时深受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在政治上向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山外丛谈”所谈的大体不出理性和容忍这一主题。后来我和几位朋友合作，成立了一个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主要是出版一些文艺与思想方面的书籍。由于社中朋友们的怂恿，我便在“山外丛谈”中选了几十篇印成这本《到思维之路》。这些浅薄的少作，当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不用等到壮年便已自悔孟浪了。所以我后来一直叮咛高原出版社不要重版。

这次在台湾重印则是受到朱一冰先生和黄俊杰先生的再三鼓励，使我有盛情难却之感。而且我后来想想，无论我自己怎样不满意这些少作，但既已为人所知，终不免有重祸梨枣的一天。与其将来被人盗印，倒不如由我自己整理一番，正式再版。所以在重印之前，我曾抽空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三十年后重读这

些文字，几乎不能相信是出自我的笔下。其中幼稚肤浅之处，自然极多。不过以三十年后的我回顾三十年前的我，似乎也不应该用过分严厉的眼光。至少就大体的思想倾向而言，我还觉得这册小书是健康的，不妨推荐给青少年的朋友们。今天的我虽然在知识方面增加了不少，但是已失去三十年前那种胆大妄言的勇气了。

就个人情感方面说，我对于当时写作的流亡岁月则是十分怀念的。三十年前在香港的难民生活已不是今天国内的青年们所能想象。我们飘零在一个殖民地的社会里，四顾无依，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正如杜甫所说的，“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无论是做编辑或是写文章，一大半都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龚定庵“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正是我们那些流亡知识分子的最好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唯一的精神凭借只是不相信中国会永远在无理性的状态下存在下去。依我自己当时的想法，写作既是谋生的唯一方式，那就必须利用这一方式来改变现状，至于是否有效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最使我感动的是读到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所引的一则佛教故事。这个故事说：

昔有鸚鵡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卷二）

我当时并不敢奢望可以感动天神来灭火，但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曾经侨居陀山的鸚鵡，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际尽一点心意。所以50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都可以看做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点。这册小书自然也不是例外。

我希望今天读者都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旧作。

1981年11月5日于美国康州之橘乡

## 《文明论衡》自序（1955）

本书所收的几篇论文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是讨论文化问题的。前面几篇是讨论文化原理的部分，曾在“文明论”的总题目之下分别发表在《人生》杂志上。关于文化哲学方面，我曾拟定了十几个子目，准备陆续写成一分量较重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个人学力之所限，对于一些自己还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便不敢遽下断语，故有些观念虽已在我的脑海里盘桓甚久，我仍然没有勇气随便写出来。还有一些事实上的困难也值得谈一谈，首先是我自从入新亚研究所以后，主要的精神都集中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面，一般写作的功夫自然减少得多了，尤其是文化哲学所牵涉的范围太广，一个问题之提出至少要有相当时间的准备，这在我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往往要隔一两个月才能写成一篇。其次是参考书的缺乏。以往讨论文化哲学的人多偏重于“哲学”与“精神”方面，故不免有武断不合历史事实之处。在近代学者中只有汤因比（Toynbee）、达尼列夫斯基（N. I. Danilevsky）、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索罗金（Sorokin）等少数人是例外。我想文化哲学如果真要成立一门踏实的学问则不能不建筑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关于文化研究的最大科学成果则当推新兴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他如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社会学等亦占重要的地位。而我个人对于这些学问却都是门外汉。益以香港书籍之缺乏，更使我有“力不从心”之感，有时虽有一点见地也因为缺乏材料而无法动笔。在这种种困难之下，本书所收的一些论文实在是简陋得不成



样子。我只希望将来能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书籍时再修正与补充已写的论文，并继续草成悬而未写的子目。所以我最后决定将此书定名为《文明论衡》第一集，以示初引端绪之意；而且将来若再有这一类文字，亦可继续出第二、第三等集。这是希望读者们谅解的。

附录所收的几篇论文可以说是前几篇原理的实际运用，而且都是和近代中国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如何求配合诸问题有关，虽语多空泛而实经反复思维所得，读者阅此数篇将更能了解前几篇的含义所在。作者近年来思想态度上有所改变，全书力求兼容并包与融会贯通，而无取于“罢黜百家”之狭隘胸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是开创的，一方面又是集大成的，这两种性质都只有在一种极其广阔的精神中才能表现出来——渺小的灵魂是承担不起伟大的时代责任的。作者于此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纵使本书毫无知识上的价值，这一点继往开来的心愿也还希望能获得读者们的同情与支持！

1955年5月15日于香港新亚研究所